

农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百年华诞庆典学术交流活动综述

肖 阳 徐定懿 冯竹清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5-0138-08

2020年9月18-21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南京农业大学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百年华诞庆典学术交流活动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成功召开。来自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65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9月19日,中国农业历史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学会88位会员代表参加,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理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了学会学术顾问名单。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隋斌当选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王一民当选监事长,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陈军当选秘书长。本次换届共选举出副理事长9人、常务理事27人、学会副秘书长11人和新一届理事会成员85人及监事会成员3人。会员代表大会还表决通过了《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章程(草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费管理办法(草案)》等重要规定。

9月20日,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百年华诞庆典隆重举行。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利根教授、江苏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宝田先生、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李伟国司长、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隋斌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刘德海、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王红谊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幸穗教授在庆典上先后致辞,从各个层面表达了对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百年华诞的祝贺,肯定了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为我国农史研究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大会主题报告环节中,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长隋斌研究员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分享了弘扬中华传统农业文化的成功案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樊志民教授也发表了演讲,题为:传统农业时代一场复杂的革命——铁犁牛耕的历史与意义。此外,庆典还播放了《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万国鼎》纪念片,随后进行了院友礼品捐赠和纪念院庆诗歌朗诵。

庆典上,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介绍了研究院的百年发展历程。作为中国最早的农史研究机构,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历史可追溯至1920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农业部、美国国会图书馆合作筹建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着手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农业文献。1929年,万国鼎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讲授“中国农业史”课程,这是国内首次开展农业历史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农村文化振兴之路研究”(2018SJA0036);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战后日本农村文化振兴之路研究”(SKYC2018010)

【作者简介】肖 阳(1984-)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日农业比较研究;
徐定懿(1983-)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冯竹清(1992-)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史教学。1955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组建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研究中国农业历史为主要任务的国家级专门研究机构。1979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回归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1981年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刊,同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获国务院批准取得农业史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89年获批成立农业史学科博士后流动站(1995年学科专业调整,授权调整为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至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为国内唯一具有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各层次农史专门人才培养的基地。2001年,为了响应国务院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号召,在整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等平台和资源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2004年,国内首座系统展示中华农业文明和历史渊源的专题博物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在南京农业大学正式开馆。2006年,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首次入选江苏省重点学科,2011年第二次入选江苏省重点学科,2016年第三次入选江苏省重点学科。2014年王思明教授当选为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成员。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经专家论证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批准,以科技史学科为基础正式筹建文化遗产本科专业,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以农业文化遗产专门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的本科专业。

百年来,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以研究和传扬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和灿烂的农业文化为己任,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结构优良、梯队合理的专业研究队伍,结合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近年来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大局,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支持与配合下,陆续展开“江苏特色村镇研究”“中华地标品牌公益工程”等课题研究;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协同创新研究基地”等研究平台。从专业专长出发,协助各级政府做好精准扶贫、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开发、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0日下午,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农史研究从多个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本次学术研讨分为四组,分别是:农史研究总论和传统农业文化的应用与传承研究;农业科技史研究;农业古籍研究与农史考证;中外农业交流与农业民俗文化研究。研讨会共43位学者做了现场报告。

一、农史研究总论和传统农业文化的应用与传承研究

农业史是研究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及农村社会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的一门学科。因农业在古代社会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因此农史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研究农史,对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具有广泛的基础性科学价值,鉴古知今,农史研究还能为当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中华传统农业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等思想和理念恰为当今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因此学界一直致力于挖掘传统农业文化的精髓,并将之应用与传承。

(一)农史研究总论

农史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南京农业大学包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本次会议的学术交流环节,包平教授在《千年物产整序与时空变迁》中以方志物产为切入点,简述了方志中与物产相关的内容和分类体系的变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着眼大图景、采取大历史的纬度,计量科学手段和计量史学的发展可以弥补方志中没有按物产种类分编成册等可能存在的缺憾。他还介绍了目前的主要工作:基于内容的智能知识组织与挖掘,以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通过智能识别进行关联研究和可视化呈现,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法识别实体等方面的研究。

青岛农业大学马刚教授发挥地区优势做了题为“黄河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影响”的报告,介绍了黄河

和山东的历史发展,指出山东地区原始农业的产生有赖于黄河,黄河对山东地区的土壤、地形和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刚阐述了从北辛文化到齐鲁两国的农耕文化的变化,以及黄河的改道与政治经济政策、水利、农业等方面的关联,并进一步提到大运河对山东尤其是山东西部的影响,以及黄河对近现代水利的影响,认为将来应该系统化治理,融合与协同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既是对农业生产现实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农业过程的规律性揭示,是世代农民的智慧结晶,同时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研究馆员、李琦珂副研究员在“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现代启示”中介绍了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中的“一个观念,六种思想”,即“天人合一观”和“三才、三宜、相生相克、物质循环、资源保护、适度利用”思想,并结合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总结了上述思想的现代启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周晓庆研究馆员在“从近代以来重农思想演变看中国农业百年变迁——兼谈农业基础地位”中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重农思想与中国农业历史变迁的显著关联。他认为,甲午战争以前,以农为本的思想被“师夷长技”和“重商主义”等思想削弱、挤压,中国农业的弱势在这一阶段显现。1895年之后,重农思想回归,西方农学思想和方法得以引进,中西方农业逐渐融合,中国农业开始了近代化进程。戊戌变法正式提出了变革农业的要求,民国时期在“农工立国”思想之争中,因民国政府的重农思想中缺少了“关心农民利益”内涵的支撑,工业立国对重农思想形成挤压,农业复兴政策失败。1949年之后,农业一度受到极左思潮干扰无从发展,传统重农思想被扭曲;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农民自主权、提高民生、维护民利,确立了内涵更加博大,视野更加宽广的新时代重农思想。

(二)传统农业文化的应用与传承研究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丰富多样,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保护和传承传统农业文化一直是农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柏芸研究员在“浅谈农业文化元素在农业文化园中的运用”中介绍了近期农业文化园的发展,以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室外展园为例,分析了农业文化元素在农业文化园中的植入及其效果,阐述了农业文化元素的选取与展示方式、布局设置等方面的需求,并提出了具体的运用方法。广西师范大学的乔柏教授则是以祠堂为切入点,在“祠堂文化与现代乡村建设”中简述了祠堂与祠堂文化的基本定义,指出目前对于祠堂文化的保护整体不容乐观的现状,以历史名村——蓼村为例,讲述了目前的祠堂保护、重建、文化展示和推广等情况,并总结了祠堂存在的历史文化软实力功效。

传统农业工具是传统农业文化的载体,农业工具凝结着劳动人民对农业生产的认识和智慧。禾剪,又称禾镰、手镰、剪禾器、摘禾刀,是西南少数民族常用的极富特色的收获工具,主要用来收割谷穗。华南农业大学的王宇丰副教授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禾剪’”中详细介绍了禾剪一词的含义、形态以及用途。认为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糯稻具有不易以镰刀收割也难以就地打谷、必须逐穗收割的特点,同时迎合了选种、田间除草、肥田、取秆、增收等需要。最后他将禾剪与糯稻文化联系在一起,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禾剪节,发掘了禾剪的文化意义。

宣纸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珍贵遗产,主要是以皖南山区青檀树枝的韧皮为原料,辅以沙田稻草,经过精心加工制作而成。在中国宣纸发展史上,泾县“汪六吉”宣纸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质地被尊称为“纸中之王”。安徽财经大学的曹天生教授在“汪六吉宣纸考述”中,介绍了安徽宣城的“文房四宝”产业,尤其是宣纸产业的发展情况,将宣纸定位为“高级农产品”,总结了汪六吉宣纸的历史及其对宣纸行业的贡献。

畜禽养殖是我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着悠久的猎兔以及养兔历史,古代劳动人民对兔的驯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兔的驯化与养殖过程既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心血的凝结,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一个缩影。安徽财经大学的苏成爱研究员在“中国养兔起源考”中,首先简述了兔的名称、分类、总结了前人对家兔起源的研究,并对中国养兔的主要种类进行了介绍。通过妇好墓出土的玉雕等实物资料和《后汉书》《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记载对中国养兔的起源地和起源时间进行了考证。

稻鱼鸭共生系统是我国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典型代表。

贵州师范大学的严奇岩教授在“清代以来贵州黔东南地区禾改谷与稻鱼鸭共生系统的变迁”中介绍了贵州黔东南州的稻鱼鸭系统,分析了稻田养鱼技术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他从民间文书、日记等材料梳理了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稻田养鱼的历史,并就历史上稻田养鱼与糯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严奇岩认为,稻鱼鸭共生系统虽然已经式微,但其对环境更加友好,在未来应当继续发展。淮北师范大学的熊帝兵教授在“中国古代‘踏粪’技术传承与变迁”中对于“踏粪”技术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通过分析汉魏时代的肥料生产制造技术,总结出了踏粪技术的先进性。他介绍了后世农书对“踏粪法”的征引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并综合对《王祯农书》《沈氏农书》中的相关内容记载、踏粪技术的发展路径以及后世人们对这一肥料生产技术的了解进行了全面立体的阐述。熊帝兵认为,踏粪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土地利用与地力衰竭这一对农业中的重要矛盾。

另外,四川大学的张箭教授将研究着眼点放在了作物的传播研究,他在“西红柿的世界发展传播史研究”中首先总结了前人关于美洲农作物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展示了早期文献中对西红柿的描绘。随后对西红柿的起源进行了考证,主要包括西红柿的人工栽培的起源、西红柿被接受和传播的路线、以及目前已知的与西红柿栽培相关地点。

二、农业科技史研究

农业科技史是农史的传统研究方向,也是农业史领域研究最深入、最成熟的部分。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研究员在“中华和谐农耕基因的起源、特征及其表征演进”中首先介绍了农耕基因的概念及起源,从地理环境和文化要素论证了农耕基因起源的原因;阐述了农耕基因衍生出的和谐共生理念与思想,包括“三才观”“循环利用观”“地力观”“节用观”等。最后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和谐共生观念,虽然试图与自然和谐相处,但环境的自身变化以及人类生产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还是导致农耕基因表征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即是种植作物的变化,种植作物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段,北方旱作小米时代、北方旱作小麦时代和南方水田水稻时代。

(一)农业种植技术与农作物传播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马旭铭研究馆员做了题为“关于传统农具定级标准的几点思考”的汇报,他在回顾传统农具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农具的界定和定级提出了宝贵意见。在传统农具的界定方面,他建议通过研究给传统农具确定科学的定义,确定其内涵和外延。马旭铭认为传统农具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农具的传统材质、传统制作工艺、传统的功用、以及使用动力共四个方面。另外,由于传统农具具有突出的科学价值、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深邃的历史价值,出于保护传统农具的客观要求,对现有保护标准进行补充和完善、制定传统农具定级标准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他还提到在制定传统农具定级的标准上,要遵循国家制定标准的相关规定以及遵循标准的和谐一致性等原则。

佳木斯大学的马伟副教授在“近代中国东北农耕法的演变与发展”中总结了近代中国东北农耕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古代,东北地区的耕作法以垄作耕法为主,历史悠久且行之有效。晚清以来随着移民实边的推行,该耕作法长期为农户实践,具备防旱防涝增温的优点,但由于垄作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当地雇佣劳动盛行。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后,试图以“北海道农法”来改良垄作耕法,以平畦代替垄作,践行“自作农创设主义”,以实现增产增收;二战之后,在以往的基础上,东北地区逐渐探索出了平垄结合的“深松耕法”“深耕轮翻”等方法。

“从自然传入到主动接纳:麦类作物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传播”一文是南京大学博士生任文洁的报告题目,该报告从麦类作物与牧业相互关系的视角探讨了麦类作物如何传入中国境内以及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传播过程。她指出,麦类作物在西亚地区被率先驯化以来,伴随牧业被捆绑传入中国境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阐述为:麦类作物极有可能在天然牧草季节性短缺时起到提供饲草补充的

作用,而其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传播经历了自然传入和主动接纳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龙山时代至殷商时期,通过分析麦类遗存,可以认定麦类作物传入早期,极有可能是作为经营牧业的饲草而自然传入的;在后一阶段,随着殷商时期麦类开始扩大种植,使得麦类作物作为农作物的功能被逐渐认识,又因其特殊的生长周期,在黄河下游地区得到进一步推广。

华南农业大学的硕士生刘安壕在“清、民国木薯在广东的引种推广及动因探析”中对木薯的最早引种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考辨。他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木薯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为清道光初期或稍前,即公元1820年前后;经过对文献记载和口述资料的汇总分析,推断木薯可能是由信宜华侨由南洋引入种植,始种地当为信宜。回顾木薯的传播过程,由于其引种路径多元化,推广种植的省份众多,导致了对木薯的称呼存在大量异名。他针对木薯的推广历程,通过梳理广东历代方志、民国档案、科研期刊等,将木薯由清代引种到民国推广的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一是引种初期:逐渐推广(1820—1911年);二是科学种植:初见效益(1912—1936年);三是抗战时期:大力发展(1937—1945年);四是抗战结束:持续发展(1946—1949年)。

(二)历史上的农业水土利用与农业灾害防治研究

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农业种植、发展的内部规律,还要研究农业同外部条件之间的适应与改变。我国土地辽阔、类型多样、土地资源分布不平衡、土地生产力地区间差异显著,农业土地资源不算特别优秀,世代农民经过长期以来累积了很多农业水土利用与灾害防治的经验。

信阳师范学院讲师张乐锋在“清代沙颍河流域的水利纷争与历史书写”中介绍了清代沙颍河流域内地形原因造成的水患灾害,以清代杨廷望兴修水利为重点介绍了历史上进行过的水患治理。还指出,对于杨廷望兴修水利的行为,上蔡地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位于下游的项城地区则经历了从“愤激之言”到客观公允的过程,这反映了地方应对水患灾害的过程中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地方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谢智飞在“宋代东南地区水利工程的石工技术”中,明确了主要包括宋代东南五路的研究区域,该地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有限,主要农作物包括稻作、麦作以及茶、棉等。然后以宋代东南五路的水利工程为研究对象,介绍了水利工程从土质堰坝、草土堰坝向砌石堰坝的转变,而其中的石工又具有稳定、坚固、持久的特点。他以全然采用石工的水利工程——“木兰陂”为例,论证了石工在水利工程建设的重大功用以及围绕水利工程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在石工的具体技术上,以“胶结技术”为代表,对石灰胶泥,石灰烧制,石灰、沙石、水的比列分别作了探讨。在石料开采上,探讨了开采标准和人力的使用,以及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

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邓惠仪在“唐宋蝗灾诗书写研究”中主要以唐宋诗歌中的蝗灾记载为研究对象,分时期梳理了唐宋诗歌中对蝗灾的记载内容特点以及其代表的社会思想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生朱艳梅在“明清时期安庆地区水旱灾害探析”中,整理分析了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水旱灾害,并介绍了明清政府和民间个人分别为应对水旱灾害、保护农业生产采取的措施。

在水土利用和灾害防治之外,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格格教授将研究着眼于旧石器时代到商末周初时期的马与马学上,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整理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马的起源地之一,并在家马的传入上,提出了两条传入路线。马学方面,她指出商代古人已初步掌握了简单的养马知识,至青铜时代晚期,周人在马匹的优良品种传承、马匹的科学管理、马匹的健康生长等方面逐步掌握了更科学的养马方法,周代马业发展为中国古代马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泰州学院讲师陈蕴鸾在“清代前期江南三府的白粮改折”中指出在清代前期,江南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白粮改折,从清初南运白粮的永久性折银与北运白粮的临时性的折银,至乾隆年间的北运白粮大半以上改漕,以粳米抵给,白粮正米的征收大为减少。这一改变带来了白粮解运方式的变化,由清初的官收官解,雇募民船装运,至康熙十四年改由漕船带运,使得相关的员役经费,变为参照漕例编征,三府在编征款目和数额上也逐渐统一。清代前期三府白粮的改折,是明清赋役制度变革背景之下的结果,体现了从实物

税向货币税,力役向折银征收的转变,促进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江南地区重赋埋下伏笔。

三、农业古籍研究与农史考证

我国农业古籍数量众多,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代有传沿和创新,为世界农学史所罕见。农书集中记载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农业遗产和文化财富。研究农史过程中需要以农业古籍为基础,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梳理、考证和分析。

(一)农业古籍研究

农业古籍是农业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遗产,对这份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既是我国农史研究的起点,也是世代农史研究者们一直未曾忘却的“初心”。《四时纂要》是唐五代韩鄂所撰的月令式农书,是一部集中农副生产和日常生活各方面知识的“农家实用大全”。郑州大学王星光教授、博士生李勇在“朝鲜癸未字本《四时纂要》初论”中,通过梳理《四时纂要》的历史记载,认为该书在宋元明清时期有一定流传,但国内未发现完整文本。1960年在日本东京发现重刻本,2017年在韩国庆北礼泉郡发现癸未字本。王星光教授重点介绍了癸未字本《四时纂要》,其因铸刻字体为癸未字而故称;并详细比较了癸未字本与重刻本的异同之处,分析认为《四时纂要》不能说明唐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棉花种植技术。最后王星光教授指出《四时纂要》的两个版本均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农业文化的交流,是中国文化辐射域外的重要见证,在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其内容涉及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系统性农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温州大学讲师王长命在《〈齐民要术〉记载茎秆淀粉类乔木榿木莎木都句名实再考》中首先分析了前辈学者对“莎木、都句、榿木”种属的判定与依据、介绍了农史学家缪启愉、石声汉先生做过的相关科学性尝试,然后对“莎木、都句、榿木”这三个名词进行了语源的复原与种属判定,并结合明清人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考察,考证了“干捣之亦或是干,捣之”的具体含义。最后作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认为三个淀粉类乔木的语源都是南岛语系,这三个名词经历了被转译成汉文,以及被纳入中古南方的地理著作中,最后又被《齐民要术》这样的北朝农业百科全书所录的复杂过程。江苏科技大学杨虎副教授、硕士生曹慧玲在“《齐民要术》中的蚕桑科技述评”中指出,《齐民要术》收录了详细而丰富的栽桑养蚕技术,反映了北魏及其前代在蚕桑科技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积累。报告人重点从桑拓育苗技术、育蚕生物技术、蚕业生产配套技术三个方面对《齐民要术》记载的蚕桑科技做了述评,并指出我们应该传承与发扬先人对蚕桑等农业科技的热爱与探索精神,进一步发掘古农书等文献中的科技与文化成果,为今天蚕桑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撑。

(二)农史考证

赋税制度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农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南京师范大学的晋文教授在“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方式”中通过解读岳麓秦简、北大秦简,阐述了倾向于秦朝的某些统治区域曾实行过“税田”十一之税的看法的原因。并通过秦简互证,证明了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实际有两个同时参照的租率。最后作者得出五点结论:首先,秦代田租确有地区差异,又有农作物区别;其次,曾经涉及广大民众的经济活动总会留下它的各种痕迹,并最终被后人发现;再次,秦人发明的对田租的征收方法同时参照两种租率,是当时条件下最为简洁方便而又相对公平的做法;第四,从产量预估往往存在误差来看,以往争议颇多的“益田”或“减田”也并非真要增加或减少农田,而是用数字计算方式将错就错地平账;最后,秦代“税田”面积的不同税率规定,也表明了秦王朝在经济管理和稳定边远地区方面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

我国地理跨度大,在农业生产上体现出了区域差异性,这就产生了对区域农业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皖西学院关传友副研究员在“汉代以前皖西地区的农业”中将汉代以前划分为史前、夏商周和秦汉三个

时期,并按照这三个时期分别论述了皖西地区的农业基本状况,利用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分析了汉代以前的皖西地区的农业,包括农作物的品种和分布情况以及水利情况。

宁德师范学院赵利杰副教授在“高粱名称考释”中对古籍中高粱的名称进行了详细考释。他首先指出,高粱作为一种外来作物,别名众多,超过140个,并认为高粱别名众多的原因主要有高粱传入历史和路径复杂;古人在植物分类学认识方面的讹误、谐音关系导致同音异形的多种写法等,最后着重分析了高粱的命名特点。

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生徐驰在“清代茶叶对外贸易研究(1644—1911)”中对清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做了分期研究,四个时期分别为:对外贸易萌芽时期(1644—1700)、发展时期(1700—1840)、鼎盛时期(1840—1886)和衰败时期(1886—1911),并通过梳理清代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对清代茶叶对外贸易的贸易路径、贸易方式、贸易性质的变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硕士生王宇燕在“我国古代竹笋的多重价值”中通过对《齐民要术》《笋谱》等古籍文献资料的考察,阐述了我国古代竹笋的多重价值,具体来说具有:食用价值、药用价值、文化价值等。报告通过对竹笋多重价值的解读,阐明了竹笋的多方面的功用,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系。

“四季豆在中国的引种与推广研究”是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冯竹清的报告题目。作者主要从地方志资料入手,考辨了历史时期四季豆的众多名称,归纳了四季豆在中国的引种时间以及海上和陆上两条传播路径,初步探索出四季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推广过程,并分析了四季豆在全国推广的动因。

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邢苏的“国内外农村土地制度实践经验与启示”主要考察了美国、日本和英国三国历史上农村土地制度的经营模式及保障措施,并以关山模式、鹊山模式、“隆平粮社”模式为例,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改革方案和模式进行了分析,归纳总结出有序合理地进行土地流转、明晰农村土地产权边界、正确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健全法律法规制度等经验和启示。

四、中外农业交流与农业民俗文化研究

中外农业交流,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是世界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现在广大人民衣食所资的粟、黍、稻、麦、豆、麻等重要作物都是中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驯化栽培成功的。历史时期中外在农业种质资源、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文化等方面进行着广泛的交流,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农业生产格局。

(一) 中外农业交流

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一直是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外农业交流丰富了中外国家的农作物种类,影响了中外国家农业科技文化发展和饮食习惯。福建师范大学左昕昕副研究员作了题为“黍和粟在距今6000年前后传播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报告,她使用植硅体分析的方法,发现了整个南方迄今为止最早的旱作作物遗存。通过对白头山遗址和县石山遗址的科技考古分析,得出了黍粟早在6000年前后已经传播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至迟在5000 a BP前后,黍粟和水稻一样可能普遍存在于多个遗址的结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宋超教授、硕士生许琳在“古代中越农业科技交流及其特点”中,介绍了古代中越农业科技交流的历史背景、途径以及主要内容,并总结出古代中越农业科技交流的主要特点:交流途径多样、交流范围比较全面、由单向逐步转化为双向和重视实用技术等。

来自湖南省双峰县原政协副主席、县农科所所长徐迪新和双峰县农业局农艺师徐翔在“中国水稻品种在赞比亚的试种和推广——杂交水稻首种非洲获高产(1975—1994)”中介绍了为适应赞比亚生态环境的需要,中国专家于1975—1994年间在赞比亚进行了长达19年水稻栽培种植。经过与国内同品种种植状况的比较,总结出了赞比亚地区种植的水稻呈现出生育期延长、植株低的生物特性。赞比亚地区种植的水稻产量高,节穗率也高,从而得出了中国水稻品种是适合在赞比亚种植的结论。

云南农业大学曹茂副教授在“澳大利亚农业干旱简史与政策实践”中通过梳理澳大利亚联邦农业干

旱简史及其干旱对农业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分析了澳政府应对农业干旱的政策实践,并总结出澳大利亚农业干旱的政策实践对于我国应对农业干旱的启示,主要包括:1. 制定应对农业干旱风险管理政策;2. 培养节水意识,改革水管理方式;3.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村抗旱能力。

清华大学博士后张瑞胜一直致力于从事中美跨国科技史研究,本次学术交流环节,他讲述了民国时期中美农机的贸易状况。民国时期,美国私营企业通过捐助对中国农耕进行改良,推动了中国农种改良建设。二战后期,农业机械化在中国得到迅速推广。1948年后,中国派往美国一批学习农业机械的留学生,美国派一批教授前往中国,为新中国农机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促成了农业机械研究院在中国的成立。

(二)农业民俗文化研究

农业民俗文化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文化观念体系与精神心理结构的外在显现,它包括乡风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节庆文娱等,反映出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价值观、社会观、生活观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泰山学院张鹏副教授在“桃文化与女性及情缘”中提到桃树是一种古老而吉祥的树种,其花、果、枝等各部分蕴含着多种文化意象,人们对桃有特殊的图腾崇拜。桃还具有生育信仰,其内涵的长寿文化,忠孝节义、辟邪吉祥的美好意象都值得我们关注。作者还通过分析古代关于“桃”的古诗词等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指出文人墨客常用美丽的桃花比喻女性的容颜;同时桃花的色泽与女性情窦初开或坠入爱河时美丽的肤色有异曲同工之妙,故通常以桃花为载体来歌颂爱情;又因桃树寿命仅十余年,花期短暂,人们以桃花来隐喻女性韶华易逝的无奈与伤感。桃花、女性及爱情、美好情缘之间有着文化的因缘,从女性与情缘视角挖掘桃文化,体现出人们通过农业物象暗喻表达自身的情感和审美,是农业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冯志洁在“明代江南稻作生产中的女性角色”中从江南稻作生产的基本环节出发,讲述了江南地区稻作中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几个过程。通过历史文献记载比较了南宋、宋元、明初、明中后期不同时期江南稻作生产中女性的参与状况,她认为自明代后期女性兼顾大田稻作生产与家庭纺织劳作现象普遍,反映了女性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升。

“20世纪以来史学视野下的外销画研究”是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曲静的报告题目,她以史学视野为切入点,重点论述了“图像证史”史学研究中外销画的价值。她从外销画图册的整理、外销画研究的拓展、外销画价值的转向以及外销画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深入探讨了外销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云南农业大学车轱教授、硕士生王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与生态文明”中,介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这样的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利用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起到了很好的隐蔽和屏障作用。报告者认为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与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一方面有共生和互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相互制约的关系。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王成副教授“畜牧兽医史研究与畜牧兽医史初探”介绍了现代中国兽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横向比较了包括教学在内的中外兽医史研究情况。他提出四点建议:1. 将兽医史纳入畜牧类专业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设置的通识课;2. 编写中国兽医史相关教材;3. 开展兽医史学术研讨会,提高师生对兽医史教学研究的兴趣;4. 加强与人文医学史教学团队的接触与合作,促进人类健康事业。

回顾历史,缅怀前辈教诲,弘扬诚朴勤仁的南农精神;立足当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传承与创新并重;展望未来,不断开拓农史研究领域,挖掘农史研究深度。通过这次百年庆典系列交流活动,广大从事农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必将更加齐心协力,为农史事业的发展壮大而贡献力量。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也会为成为国内领先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史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信息资源中心而继续奋斗。

(责任编辑:李良木)